

向医德致敬

□ 大海

上月体检后的几天,医院突然电话通知,说CT片发现肺有一小结节,要我立即去复查、诊断。当时手头正有事。虽然近几年常听到谁谁查出“肺小结节”,但对方“你还是尽快来吧”的关切的语气,还是引起了我的警惕。两天之后去就诊了,挂的是专家号。医生倒也没有大惊小怪,只是说:你尽快住院,我们组织会诊,讨论手术方案。看样子事情不妙,但我还算镇静。于是问:能确诊吗?他说,那要手术时做了切片、化验后才能确诊是良性或恶性。于是又问:如果是良性的呢?答:那就把刀口缝起来嘛,你不就放心了。他的语气越是平淡,越让我毛骨悚然。我谢了后就离开了。

我虽然在大自然中探险40多年,仅青藏高原就上去六次,在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还爬到海拔5200米。遇到的艰难危险不可谓不多,自信还是有定力的。但医学毕竟是科学。我为自己定了四字方针:积极、慎重。又找了几家医院就诊,但意见仍是尽快动

手术。虽然不是惊惶失措,但也生出惶惑。关心的朋友建议去上海专科医院复诊。刚巧报上有篇文章,报导了上海胸科医院举办了一次“让肺癌无处可逃”的宣讲活动。大意是说:“现代医疗手段层出不穷,专家预言——肺癌有望成为慢性病。”

读了后很有感触。我请上海出版社的朋友朱主任帮我预约专家挂号,她在网上找到了对肺小结节有研究的储天晴主任医师。半月之后我们去了。储博士是位女同胞,虽戴着大口罩,但约摸也就30多岁。待我们说明来意后,她仔细地对照着审视带去的几份CT片和诊断书意见。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,与我遇到的多数医生大不相同,他们只快速瞄了一眼诊断,再象征性地看看CT片子,就立即下结论。这却增加了我对她的信任感。我多少有些忐忑,老伴更是悬着一颗心,等待她判决的时间似乎很长。她的眼睛终于离开CT片子,微笑地转向我们,很关切地问:你的想法呢?我说:能不能确诊?有没有不用手术的治疗方法

法?她说的大意是:我也不赞成现在就手术!肺小结节检出率现在确实高,但并不都是恶性的,如你80多岁的高龄,发展的速度一般说来不会太快,再观察一段时间吧!我说,当地的医生说还在长大。她说,不同的片子,不同的医生操作,肺小结节的尺寸不一定完全一致。我又问:现在应该怎样治疗?答:目前可暂不采取措施。又问:能确诊吗?答:观察一阶段再说吧!思想放松,别背个包袱,该干啥干啥!即使恶化了,现在医学发达,治疗手段多,没什么可怕的。

老伴、朱主任和我个个喜笑颜开。朱主任兴高采烈地说:刘老师,我说没事吧!我却在想真该感谢她父母为她取名“天晴”,阳光、温暖。不像有的医生讳莫如深,能吓得你半死!

从她的身上,我对医德的内涵有了更深切的体会——全心全意守护着人们的健康。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、兢兢业业,爽朗、朴实,视病人为亲人般的关怀、体贴……崇高的医德使我很感动。

永远的遗憾

□ 马政保

六月是高考月,关于高考的故事在不断刷屏。提起高考、大学,有的人一脸兴奋,有的人莫名的无奈,而我则是永远的遗憾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高中毕业,那时考取大学的人凤毛麟角,大学生称为“时代骄子”。自己和大多数同学一样,通过参军、顶替、考取技工学校就业。我在技校读书两年后进厂当工人,十年后上了成人学校,领取了一张大专毕业证书。

近些年更感知到了遗憾带来的压力和沉重。由于工作的关系,近几年经常与设计院、政府部门打交道,人家会随口问一句: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呀?我总是支支吾吾道:我,没有上过大学。自己负责养老、现代农业项目,也竭力搜寻,苦读恶补,可是在人家大学老师、行业领导面前不敢大声,因为那些支离破碎的知识难以“装扮”自己,知识上总缺一把火,随时会穿帮露馅。我想,自己要是某个大学的毕业生,至少可以平起平坐地交流吧。

一位老哥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钢铁院校毕业生,两年前他的孩子举办婚礼,我与他的同学在一桌。从全国天南海北来的同学不是教授就是老总,酒喝得微醺,个个神采飞扬,回忆起当年挥斥方遒的青葱岁月,议论着学术新发现,笑谈起校友的“进步”。想想我的技校同学,不仅都在合肥市,而且都分配在一个厂,聚会时话题干瘪,谈欢之间毕竟少了点什么。

前不久,到庐江县参观孙立人旧居。孙立人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,后来居然考取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,成为抗日名将。他跨入了两个毫无联系的专业,居然可以做得风生水起,着实让人敬佩。

我的遗憾还表现在自己对高校生活的羡慕和对先哲前贤的崇敬上。孩子考上大学又考上研究生后,有了机会到大学闲逛,喜欢读大学校史,咀嚼大学的校训,了解大学的趣事。看着自己的孩子和同学骑着单车,或者抱着一摞书行走在校园,自己当年要这样该有多好呀。一次公干到云南省昆明市,我执意到西南联大旧址,这里大师云集,陈寅恪、冯友兰、刘文典、吴宓、吴大猷、朱自清哪一个不是熠熠生辉?参观教室时我在想,自己只要在这样的大大学不说大师耳提面命了,只要待上一段时间,经过大师的点拨,也一定会成就一番天地来。没经过那一阵炉火的锻炼,就淬不成真正的好钢。但是,当年落榜生的我已年过半百,今天已经不可能进大学读书了。其实,无论在南翔学习修理挖掘机还是在985大学攻读,只要我们不懈努力,学到丰富的知识,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,就不会有遗憾。

犹记童年割麦子

□ 郭旺启

立夏时节,公路两旁的麦田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,在风儿的吹拂下,麦子此起彼伏,形成了阵阵麦浪。经历了寒冬风雪的洗礼和暖春雨水的滋润后,麦秆上早已结出青色的麦穗,上面钻出又细又长的麦芒。我知道麦子经过小满时节的灌浆后,到芒种时节就可以收割了。

看着无边无际的麦田和即将成熟的麦子,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童年割麦子的情景。

那时,农村还没有割麦机,农田的麦子都是农民用镰刀一镰一镰地割下来,十分辛苦。芒种时节,天气十分炎热,恰是割麦、收麦、打麦最忙碌的时候,由于正处于农历五月,农人称之为“忙五月”。

芒种时节,麦穗成熟了,金黄金黄的,远远看去,麦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,给人一种丰收在即的喜悦。

割麦前,必须先用磨刀石把镰刀磨一磨,这样割起麦子来才锋利。清晨,天色刚亮,父母就带着我们姐弟几个,推着小推车,带着镰刀和麻绳,去田里割麦子。父亲分好任务,每人一垄或两人一垄,就开始动镰了。我们左手握住一簇麦子的中间,右手用镰刀对准麦秆的底部,使劲儿一拉,就割断了。割好后,要让麦穗朝同一个方向,把麦子一堆一堆摆放整齐。看看割得差不多了,就用又粗又长的麻绳捆麦子。捆好后,两人合作抬起来,放在小推车的两边,一边一捆,再用车上的绳子固定一下,就可以推到打麦场了。这个重体力活儿,一般是由父母完成,而我们姐弟则负责用绳子拉车。如此反复,直到推完了割好的麦子,我们就可以回家吃饭了。

一天之中,只要不下雨的话,一般要割三次麦子,分别是清晨、上午和下午,中间正好避开阳光最强烈、气温最高的时段,以免导致中暑。割麦子也相当辛苦,不仅热得满身是汗,而且累得腰酸背痛,还有被麦芒划过的胳膊又红又疼。

每块麦田收割后,我们还要利用早晨或傍晚去田里拾麦穗。一是因为可以减少粮食的浪费,二是遗漏在田里的麦穗发芽后,会和新生的玉米苗争夺营养,不利于玉米的生长。

打麦场上,家家户户的麦子都堆成了一座座小山。因为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台打麦机,所以这家刚打完,另一家就马上接着打麦。麦子经过脱粒后,经过几天的晾晒,就可以入仓了。这时候,农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身体,松弛一下忙碌的神经了。

现在,科技让种田变得更加便利了,基本实现了机械化。像割麦机就完全代替了镰刀和打麦机,一边割麦一边脱粒,十分方便,农民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。农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,又有谁会不喜欢呢?

裕溪路变迁记

□ 施光华

宏伟壮观的高架桥,川流不息的车辆,鳞次栉比的楼房,熙来攘往的人群,这就是当今合肥市裕溪路繁华热闹的面貌。

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,其实裕溪路原先称合裕路,顾名思义,即合肥至芜湖裕溪口路。而合肥人所称的合裕路,狭义指东一环和平路南端裕丰花市起,向东至大兴镇10多公里的路程。之前的合裕路也并非现在这般模样,而是与边远农村道路差不多。

我来合肥49年了,记忆中的合裕路,是两条并列的沙石单行道公路,路两侧和中间生长着高大笔直的白杨树,来往车辆非常少,有时凑巧10多分钟来一二辆,不凑巧时近半个小时难觅车子踪影。因为这里出了城算郊区,只有一路公交车,而且班次少,收工早,天未黑就停运了。沿途居民去市内办事,大多数赶上午或中午,因为下午去市内,万一有事耽误,乘不到公交车,只有步行回家了。

交通滞后带来沿途相对落后,这10多公里沿途望去,不是成片的菜园,就是大片的庄稼地;不是一排排低矮的村庄,就是沉沉洼洼的沼泽地;不是灰尘滚滚的矿渣厂,就是空气严重污染的工厂下水道。凡此种种,无不显示萧条和落后。由于地处远郊,人烟稀少,加之合裕路没有路灯,一到晚上,高大的杨树林显得黑魆魆一片,蛙叫虫鸣,显得格外凄惨。因此,此路段夏季也成了治安防范重点区域。居民们一般晚上很少出门,蹲在家里。

改革开放后,合裕路先后三次进行改造扩建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迁移所有树木,双道并一道,将原沙石路改建为三合土路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又将三合土路改建为柏油路,并对路面进行适当扩建。2000年初,终于将合裕路建设成现在这等规模。昔日合裕路两侧荒凉景象,现在由两排整齐的门面房和许多高大壮观的建筑物所替代,如建在菜地上的隆岗大酒店,建在沼泽地和矿渣厂上的红旗建材市场,建在化工厂下水道附近的安化医院和通向滨湖方向的高架桥,建在合钢附近的省妇幼保健院东区和李鸿章亭堂,建在庄稼地上的新周谷堆农贸市场等。

如今的裕溪路,迎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春风,敞开胸怀,热情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流物流,为国家建设出力,为合肥城市争光,为地方百姓造福。